

畬族盘瓠传说与其生计模式关系研究

曹大明

提 要： 本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阐述畬族盘瓠传说与其生计模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盘瓠传说对畬族生计模式具有制约作用。

曹大明，湖南郴州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畬族 盘瓠传说 历史记忆 生计模式

畬族主要杂散居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五个省，自民族形成至明末清初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阶段。“随山迁徙，去瘠就腴，无定居”^①是畬族古俗，盘瓠神话是其族源神话。杂散居各地的畬族，相传其始祖是龙犬，名曰盘瓠。以始祖神话传说为中心的歌谣传唱、敕谕文书以及祖图、谱谍，目的在于建构民族的历史记忆^②。历史记忆的建构有利于畬族凝聚畬族民族认同，有利于畬族将其当作民族迁徙的精神动力或精神支柱，更有利于畬族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将其当作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

历史记忆是指社会行动者通过书写记录或其他类型的记录而实现的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历史记忆的特点主要有：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具有选择性。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③。作为畬族盘瓠传说的一部分，以文书形式出现的“开山公据”在畬族精神以及日常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山公据”中的盘瓠传说、“免差徭”等不仅是畬族神话传说中的情节与历史的“浮光掠影”，还是其历史记忆的建构，是畬族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情境中“免差徭”的根据。“开山公据”中的盘瓠传说、“免差徭”等历史记忆犹如皑皑白雪融化成的涓涓溪流润物细无声汇聚于畬民心灵的“港湾”，影响畬族的日常生活，模塑畬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制约着畬族生计模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畬族生计模式的探讨局限于传统的内因与外因的分析，鲜见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探讨畬族盘瓠传说对生计模式影响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畬族盘瓠传说对生计模式的制约作用略作分析。

一、畬族迁徙历史

畬族主要源自湘西武陵蛮，隋唐以前由湘入赣或由湘入粤这两条路线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后在此地区融合当地土著形成畬族。畬族的迁徙一般指的是畬族如何由以凤凰山为文化地理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向周边，特别是向北向的迁徙^④。

畬族迁徙的历史分为零星迁徙与大规模迁徙两个阶

段。畬族从闽粤赣边区向北零星迁徙的时间起始于唐代。闽东、浙南畬族的盘王碧渡海传说可能反映了畬族迁往闽东的渡海经历。唐末王审知三兄弟随王绪经赣、粤入闽，因王绪无能王审知长兄王潮发动兵变取而代之，领军北归，至沙县后经劝说会师取泉州^⑤。后经畬民的帮助攻取福州。《资治通鉴》载：“（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⑥其中，平湖洞的蛮夷就是畬民，滨海的蛮夷就是蜑民。这些“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的畬民可能随军队迁徙到了闽东。至宋元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一部分畬民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强迫从闽粤赣边区迁往闽北，其中包括南宋末年被迫降的抗元畬军。闽粤赣畬族大规模迁往闽东、浙南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统治在闽粤赣边区的加强，畬族为逃避封建剥削压迫寻求生存，大规模从原居住地迁往闽东、浙南。闽东、浙南山高岭峻不易用兵，历史上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比较稳定，且依山傍海，资源丰富。“明晚期，浙南、闽东北一带种苧麻、种箬笠异常发达，需要大批劳动力，由此形成畬迁徙闽东的第一次高潮。”清初，清政府对郑成功采取封锁政策，实行海禁、迁界，造成沿海耕地荒芜。统一台湾后，“‘展界’吸引了大批畬民，由此形成第二次畬族迁入高潮”^⑦。明清时期畬族大规模迁徙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迁徙线路也不限于以上所述。畬族迁徙以家庭或房支为单位进行，或三五成行，或十几、二十人。入境后或就近落脚，或在“闽浙官道”沿线不远处栖身，或稍事停留后再继续往东北迁徙，进入闽东，以至浙江南部，后来亦有一部分再由这些地方倒流回迁。明以后赣南客家和畬族多从闽西、粤东倒迁回来^⑧。在漫长流徙过程中，畬民爬山越岭、经府过县，一般不是一次性定居，而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每经一处总有相当部分留在原处定居，而又有相当部分继续迁徙。直至民国时期，畬族才渐次停止迁徙活动，形成现在这样“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况。

综观畬族迁徙历史，无论自唐代起从闽粤赣边区向北的零星迁徙，还是明清时期从闽粤赣边区大规模迁往闽东、浙南，畬族的迁徙都是为了过上盘瓠传说中“永

免差役，不纳粮税”的游耕生活，都是为了维持其生计模式。

二、“开山公据”中的历史记忆既有情感的根基，也有工具性，且含蕴着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抗争

畲族“开山公据”中的历史记忆主要是指畲族通过被“御赐”的“开山公据”等形式的记录而实现的对其历史事件的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有其传承性、延续性和选择性。哈布瓦赫认为，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开山公据”中的历史记忆的建构是畲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为适应社会现实而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也是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抗争。

畲族最重要的文书是准予开山、豁免田赋差徭的“御赐”执照，称为“开山公据”或“抚徭券牒”。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关于其祖先的盘瓠立功的传说，一是楚平王赐予盘瓠子孙的免差徭的优待。对畲族影响至深的关键文字有：“楚平王奉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牒），付盘瓠子孙七祖，随代传流，勿令违失。……陛下敕赐‘御书铁书’与盘瓠子孙，都记三姓氏畲民，居会稽山七贤洞，永免差役，不纳粮税，永为乐也。”^⑤内容还提到：《敕赐开山公据》下发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

明以前，畲族已开始迁出闽粤赣交界地区。畲族从闽粤赣边界迁出的过程就是畲族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畲族在迁徙到闽东、浙南的过程中饱受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为适应当时历史情境的需要，畲族根据迁徙历史创造祖先神话或故事，成为民族的历史记忆。“开山公据”至迟在宋代业已存在。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曰：“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豪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掠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畲曷常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然峭！”^⑥刘称“余读畲民诸款状，有称盘护孙者。”“诸款”应包括“开山公据”，刘才会发出“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的感慨。感慨说明南宋以前畲族尚未为封建赋役所羁。南宋末年出现畲族开始承担赋役系个别现象。否则没有“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元代，闽南、闽北部分抗元武装或被元军收编而服兵役的畲民被遣送回乡后仍要入籍纳赋^⑦。畲族有关迁徙历史、“免差徭”等历史记忆的形成既有情感的根基，也有工具性，更是对封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抗争。畲族祖先传说告诫子孙不爱金山、银山，“只望青山而去”^⑧。畲族的《高皇歌》交织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根的眷恋之情，也有对自己农耕命运、艰辛岁月的悲情性诠释，既有对“命歹”处境淡淡的幽怨，也有对祖先不爱做官爱种地、不爱金银爱农具等品格的讴歌，更有对自由耕种、不纳租税的乞盼。《高皇歌》浓缩地表达了畲民对山地农耕的宿命与执着。《搜神记》以神话的形式对畲族人们这种对青山的眷恋之情作了记载：“盘瓠将女上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好山恶都。”^⑨

正因对山地农耕的眷恋与执着，畲族人们在东南青山幽谷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获得心灵上的享受。畲族人们所传唱的《封金山》既是他们心灵的写照，也是他们对丰衣足食的山林农耕生活的憧憬。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畲族山地游耕的图景依稀可见。刘禹锡《竹枝词》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李商隐《赠田叟》一诗也有“烧畲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之句。地方志对此有较多的描写。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称漳州少数民族为“畲民”时，指出当时他们使用刀耕火种的农耕技术，“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明代谢肇淛曾亲历闽北畲民“畲人烧草过春分”的壮观情景：“……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⑩清初顾炎武笔下闽西南畲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则是：“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弓矢，中兽立毙。”^⑪杨澜在《临汀汇考》中记载畲族的山地农耕情况：“汀人最重大禾米，春秋祭祀，……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⑫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详叙了粤中山畲刀耕式的生产方式：“肇人，澄海山中有肇户，男女皆椎跣。持枪弩，岁纳皮张，不供赋。……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畲蛮之类。”^⑬同时代，广东潮州西北山区的畲族亦是如此：“潮之西北山中有畲户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弓矢，以射猎为生。矢傅毒药，中兽无立毙。……刀耕火种，不供赋也。”^⑭

明初开始在畲族社区设“抚徭土官”，畲民向封建政府或“岁纳皮张”或“略输山赋”只是“稍稍听征调”。这是因封建政府根据畲族“开山公据”中“免差徭”的历史记忆而作出的，与汉民有别属特惠的轻徭薄赋。嘉靖《惠州府志》载：“……狗王后……其姓为盘、蓝、钟、苟，……国初设抚徭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久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力。”^⑮清代，绝大多数畲民已经在原居住地 and 移居地定居，并“入籍纳赋”。但畲族“开山公据”中“免差徭”的历史记忆对畲族“免徭役”仍有现实意义。各地方文献对畲族其记载从侧面说明了畲族宣扬“免差徭”的历史记忆具有一定功效。乾隆《龙溪县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⑯。乾隆《潮州府志》载：“距（潮）州七十里曰斜峒，僚人（即畲民）聚耕，不输赋税。”^⑰随着封建国家统治在畲族原住区和移居区的加强，闽粤赣结合部、闽南、闽北、赣东北、浙南、皖南畲民的赋役自唐宋以来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为过美好的山地农耕生活，畲族人们只有远离平旷、藏身于山地幽谷间逃避赋役。光绪《海阳县志》载：“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畲，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⑱同治《景宁县志》亦云：“畲民……处（州）之松、遂、云、龙诸邑，皆有其人，……佃耕以活。……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

不能存，则亡徙以去”^②。

清朝初年的“摊丁入亩”政策在减轻人身依附关系、保证了国家税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民的剥削程度没有减轻，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③。更甚者，丁银并入地赋之后，统治阶级更好巧立名目，加派差徭、杂办，老百姓苦不堪言。因而，畬族“免差徭”的诉求仍有必要。畬族宣扬“免差徭”的历史记忆有利于畬族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争取到官府对其地位的认可，并使其民族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福宁知州董鸿勋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保派徭畬民差徭。乾隆二年（1737）朝廷颁旨绘画畬民图册进览，仍准畬民不编丁甲，免派差徭。霞浦县到乾隆五年（1740）才实行“编图录籍”、“编甲完粮”^④。而后，霞浦知县曹鸣谦据畬（畬）民钟允成等的申述（词称：成等始祖乃高辛皇帝敕居山巅，自食其力，不派差徭，历代相沿，由来已久），重申福宁府知府徐元徽文，立碑出示严禁派徭畬（畬）民差徭、籍端索贴，并索砍竹木等项^⑤。福安县直到在乾隆十七年（1752）才“编甲完粮”^⑥。赣东北“不役不税”的时间更长，同治《贵溪县志》载：“江浒山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不入版图，无丁赋差役，赁田耕种而纳其租于田之主”^⑦。

悲惨的是，畬民即使逃遁入山林幽谷间、有“免差徭”的历史记忆作保护也难逃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福建闽西建阳畬民：“所耕田皆汉人业，岁纳租外，得盈余以自给，然未获之先或屡贷于人，则余谷仅足偿逋负，终岁多狼槽啃食地瓜（番薯），惟取给于种山而已。”^⑧浙江畬民：“土不与通婚姻，而耕耨佃田咸籍其力。”^⑨“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⑩江西畬民也是“赁田耕种……惟甚愿，田主知其无他，每纳租故纵之不以时收，收或不足，则恐惧，吁祈来年出息偿，至期偿息如数。”^⑪民谣“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照，瓜菜半年食，番薯米食到老”，就是畬族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如遭遇天灾人祸，境况更凄惨，卖妻鬻子，变卖家当，躲债避难，沦落为乞丐，四处漂泊流浪，甚至客死他乡。

在明以前迁出闽粤赣交界地区时，畬族迁徙历史、祖先传说、“免差徭”文本的创造是根据生存需要对其既有的历史建构，而后成为历史记忆。明代，“开山公据”仍是畬族“免徭役”的依据，畬族相关的历史记忆得到传承、延续。清以后，绝大多数畬民已定居，并“入籍纳赋”。清代雍正朝施行“摊丁入亩”后，丁税（即徭役折纳丁银）虽无，但巧立名目的差徭、杂办更多。于是，免差徭的诉求仍有必要，“开山公据”依旧有用，成为畬族“免徭役”和保护民族权益的根据。因此，畬族“开山公据”中的历史记忆既有情感的根基，也有工具性，且蕴含着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抗争。

三、盘瓠传说模塑畬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制约畬族生计模式的转变

马克思·韦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具

有禁欲主义倾向”的新加尔文派、清教派和虔信派的宗教思想，新教徒的经济伦理来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精神取决于新教伦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笔者存疑，但其研究对探讨盘瓠传说与生计模式之间的关系却具有启发。

崇拜祖先是畬族突出的民族心理。畬民认为不尊重祖先就是忘本，因此家家户户设置祖先的“香火桌”，一年中各个农事节日都要祭祀祖先，尤其是祭祀盘瓠。通过祭祀仪式、图腾禁忌、服饰等“媒介”强化畬族既已形成的历史记忆，告诫子孙不忘祖先的训诫。因此，畬族盘瓠传说中“免差徭”的历史记忆形成后表现出超常的稳定性、连续性，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未出现“断裂”、变异。长此以往，畬族的历史记忆转化成“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或“心理构图”（psychology schema），模塑着畬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由此制约其生计模式。于是，畬族坚持“只望青山而去”，以拓荒者的身份，用辛勤的劳动和自己无数的汗水创造美好的山地农耕生活。《高皇歌》和《封金山》中丰厚浓郁、坚韧耐劳的山地农耕文化精神在畬民身上得到了延续、传承，坚韧耐劳、淳朴平和、达观洒脱的民族性格得到了充分展现。《畬客三十韵》载：“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畬刀耕举，烧畬火种墟。……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与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⑫畬族妇女与男子一样，靠自己辛勤劳动共撑一片天。《处州府志》载：“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⑬畬族坚韧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又交织着淳朴善良、温和热情的另一面。道光《建阳县志》载：“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抵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⑭同治《景宁县志》云：“畬民……畏官法，鲜犯科。”^⑮史文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对景宁敕木山畬族民族性格有过详尽而又客观的评价：“我们在畬民那里逗留期间，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的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更不唯利是图，也不好奇，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⑯。达观洒脱是畬族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气质。由于畬族处于华夏的边缘，世代劳作于青山绿水间，因此与汉族相比，畬族少了几分内敛和矜持，多了几分奔放与洒脱。畬民爱歌，畬乡成为山歌的海洋，畬族的婚嫁习俗、待客之道都渗透着畬民特有的洒脱与乐观。

一个民族稳定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将从文化底层以无意识的形式作用于这个民族的生计模式。即使自然、社会环境有所变化，民族性格、文化结构以及经济伦理仍以其惯性继续前进。盘瓠传说中的历史记忆通过畬族宗教信仰转化成特定的“法规”（家族族规、各种习俗），构成一套宗教“规条”，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制约畬族社会的变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历史记忆转化而成的祖训或宗教“规条”给长期坚守山地游耕农业的畬族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动力，并由此形成对山地游耕农业的眷恋与执着的文化特质。久而久之，畬族逐渐养成了一种“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民族封闭心理，从而制约着畬民的视野，使他们不敢大胆采借

新技术、新知识,以致阻碍或延缓畬族生计模式的转变。更甚者,它使畬族人民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抗拒。自认为“住在山头似神仙”,不屑于汉族的经商。因而在历史长河中,畬民所形成的“知足常乐”、“勤劳节俭”、“不经商”、“安分守己”、“和睦团结”、“与世无争”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历史上,畬族没有出现过商人阶层,没有形成本民族的独立市场,无商品经济可言^③。

盘瓠传说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畬族的坚韧耐劳、淳朴平和、达观洒脱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畬族的这种民族性格对畬族的生存、民族的维系等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蕴涵的淡泊商贾的农本意识、族群封闭心理、乐天知命的散淡心态却对畬族生计模式的转变具有制约作用。

历史记忆是通过权威个人的个人记忆进行传播,畬族的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不像常态中的历史记忆,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历史记忆在一般情况下是历史主体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对某些历史资源做出的不同诠释,它具有相当的可变性、选择性。但在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出现重大的生存危机时历史记忆又具有超常的稳定性,某些历史资源会不断地甚至是重复的被历史记忆所唤起,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重新诠释以适应不同历史情境的需要。畬族历史记忆超常的稳定就是一种异态,但这种异态是对历史记忆可变性常态的有力说明。

在历史记忆中,什么历史被唤醒,什么历史被遗忘,更多的是缘起于现实的需要。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④。畬族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畬族“开山公据”中历史记忆既有原本的根基,也有工具性,且含蕴着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抗争。在畬族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盘瓠传说是根据畬民的情感归宿和生活需要而创作的故事,但自其形成后就以超常的稳定性得到传承、延续,通过“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或“心理构图”(psychology schema)模型畬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由此制约畬族生计模式的转变。

(责任编辑:章宏)

- ①[清]范绍质:《瑶民纪略》,见道光《长汀县志》卷35《杂录畬客》。
- ②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13页。
- ③[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 ④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491页。
- ⑤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5页。
- 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5《唐纪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版,第8457页。
- ⑦蓝运全等编:《闽东畬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 ⑧黄向春:《赣南畬族研究(硕士论文)》,厦门大学1996年油印本,第14页。
- 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州: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第254页。

- ⑩[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畬》,四部丛刊本。
- ⑪《元史》卷98《兵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09、2519页。
- ⑫《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州: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 ⑬[晋]干宝:《搜神记》卷14《盘瓠》,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8—169页。
- ⑭[明]谢肇淛:《太姆山志》卷中《游太姆山记》,福州慕园书屋,嘉庆五年重刊本。
- ⑮[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福建·防闽山寇议》,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 ⑯[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光绪四年刊本。
- ⑰[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37,明新堂藏版,嘉庆五年重刊本。
- ⑱[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峯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页。
- ⑲[明]姚良弼:《惠州府志》卷14《外志·徭蜑》,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 ⑳[清]黄惠:《龙溪县志》卷10《风俗·杂志》,清乾隆二十七年修。
- ㉑[清]周硕勋:《潮州府志》卷33《宦绩》,乾隆二十年刊本。
- ㉒[清]吴道容:《海阳县志》卷46《杂录》,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 ㉓[清]周杰:《景宁县志》卷6《武备·兵制和保长》,同治十一年刊本。
- ㉔戴祥:《清代“摊丁不亩”政策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18页。
- ㉕郁田:《霞浦县畬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 ㉖郁田:《霞浦县畬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页。
- ㉗蓝炯熹:《福安畬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 ㉘[清]黄联钰:《贵溪县志》卷14《杂类轶事》,同治十年刊本。
- ㉙[清]江远清、江远涵编:《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畬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 ㉚[清]王士鈞:《云和县志》卷15《风俗门·畬民》,同治三年刊本。
- ㉛胡先啸:《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第7卷第3期,1923年。
- ㉜[清]黄联钰:《贵溪县志》卷14《杂类轶事》,同治十年刊本。
- ㉝[清]杨澜:《临汀会考》卷3《风俗考·畬民附》,光绪四年刊本。
- ㉞[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30《艺文志·诗篇》,光绪三年重修本。
- ㉟[清]江远清、江远涵编:《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畬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 ㊱[清]周杰:《景宁县志》卷12《风土·附畬民》,同治十一年刊本。
- ㊲[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重印1984年,第33—34页。
- ㊳王克旺:《当代畬族青年价值文化变迁的思考》,载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畬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 ㊴葛兆光:《思想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